

文韵周刊 / 文艺评论

粉丝勿“上头” 偶像别“塌房”

月印万川

编者按:粉丝文化已成为当代社会不可忽视的现象。如何在珍视粉丝热情与创造力的同时,遏制饭圈乱象,有效治理扰乱公共秩序与舆论生态等问题? 本期《文艺评论》邀请三位专家,从粉丝文化的历史源流谈起,从社会、文化等维度剖析粉丝现象的复杂性,共同探讨健康、理性粉丝文化生态的建设路径,为构建多方协同的治理格局提供思考。

■ 胡一峰

粉丝,源于英文fans,大意是偶像的崇拜者。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谈论“粉丝”,一般会追溯到湖南卫视2005年举办的《超级女声》。从那时起,粉丝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粉丝的崛起给文娱业注入新动能,但也带来负面影响,诸如互撕谩骂、拉踩引战、造谣攻击等错误行为伤害网络舆论和文化生态,一些粉丝的出格行为从网络虚拟空间溢出至现实公共空间,在机场等公共交通枢纽聚集、追逐、拍摄等,更是扰乱公共秩序,引发安全隐患。这些现象促使人们深刻反思粉丝现象,探索粉丝治理格局构建之道。

“粉丝”古已有之,因网愈兴

实际上,“粉丝”古已有之,中外皆然。魏晋时期有位著名的美男子潘安,《语林》记载:“安仁至美,每行,老姬以果掷之满车。”脑补一下这个场面,和如今网络的打骂颇有几分相似。汤显祖写出《牡丹亭》后,赢得大批女粉丝,不少女子表示非他不嫁,也很有如今女粉丝在偶像演出现场大喊“老公”的劲头。《酉阳杂俎》还记载,有位叫葛清的人,十分崇拜白居易,竟在自己脖颈下纹满了白居易的诗歌。此种行为,恐怕今天的粉丝见了也自愧不如。就在互联网兴起前夜,与港台流行文化相伴而起的追星族,勾勒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粉丝景观。1993央视播出的小品《追星族》对此作了生动反映。在西方,正如粉丝研究者亨利·詹金斯指出的,从历史上看,科幻粉丝圈可以上溯到雨果·根斯巴克的《惊异故事》的信件专栏,这是一个粉丝之间以及粉丝与作者之间相互交流、讨论已出版故事的公共平台。正是作者、编辑和粉丝之间的丰富互动使得科幻小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一种极独特的文体。到1939年,这个粉丝圈发展到极大规模,他们第一次举办了世界性的科幻大会。至于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不仅粉丝文化异常发达,而且对我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从有了互联网,粉丝现象出现了新变化。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粉丝间的联系、沟通和交流必须依赖演唱会、兴趣小组、俱乐部等现实空间和行为,不论广度、深度或是复杂性,都相对较弱。互联网出现并日益介入文化生活后,作为便捷的传播方式,它帮助粉丝更加方便、快速地获得和交流偶像的信息;作为匿名的交流平台,它使粉丝更加畅快地发泄情绪;作为牢固的社群纽带,它又促使粉丝抱团取暖,以各种方式“组织起来”。近年来,不但影视音乐等领域粉丝现象经久不衰,戏曲等相对“高冷”传统艺术领域也出现了粉丝的踪迹。借助于网络传播之力,一些戏曲演员实力圈粉,演出一票难求,让古老的艺术释放了新的活

争鸣

让粉丝成为数字时代“文化参与者”

■ 郑焕钊

近年戏剧与戏曲艺术“破圈”进程中,饭圈文化侵入成为显著现象。部分粉丝行为逐渐滑向极端化。这种情感绑架取代理性、流量取代艺术的倾向,正消解戏剧审美空间,令业内人士警惕甚至排斥。但必须看到,在注意力分散的媒介环境中,传统艺术的传播与存续依赖核心观众群体。戏迷、票友及新一代粉丝以不同方式参与艺术共建。不应将粉丝群体排除,而需区分理性审美导向的粉丝文化与狂热排他的饭圈文化,在明确边界下探索正向引导机制,使其成为推动戏剧发展的建设性力量。经典粉丝理论强调“粉丝”作为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者的角色,赋予其能动性 and 创造性。粉丝通过再创作建构“参与式文化”,与偶像或原作形成批判性和再创造的开放互动,具有积极的意义。实际上,传统戏曲、话剧、评弹等传统艺术中的“票友”,就是传统艺术的粉丝。他们通过购买门票、跟演、唱段模仿、社交媒体评论甚至自发组织线下观摩团等方式,有效扩展了艺术传播的路径,并影响了演出创作的反馈链条。互联网赋权“票友”以更加能动的方式助推戏剧文化的“出圈”和传播。部分青年演员与粉丝的互动清晰呈现了一种理性、审美的粉丝关系。粉丝不只是为偶像应援的“数据劳动者”,更是传统戏曲的“再传播者”与“再诠释者”。他们主动学习越剧知识、剪辑经典唱段、整理剧评资料,既提升了自身的文化品位,也助

力。需要关注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粉丝文化的经济效应日益凸显,把本属于文化和情感活动的粉丝行为绑上了流量造星和资本逐利的战车。fans一词本就包含狂热之意,从上述前互联网时代“粉丝”现象可以看出,非理性几乎是不同时期“粉丝”的共同底色。而当粉丝在互联网条件下被明星流量所捕获,受无良资本之扶持,往往成为“造星”逐利的棋子、被诱导非理性消费的“韭菜”,当“为爱发电”的粉丝演变为“为利发狂”的饭圈,原本的趣缘组织就有可能变成畸形产业链的遮羞布。

正确看待粉丝现象的文化性、网络性和人性

把握粉丝现象的特性,是构建治理格局的前提和基础。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思考和评论粉丝现象,首先不能脱离其文化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粉丝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文化繁荣的表征,“粉丝指数”可以纳入某个类型或地区的文化发展质量指标。具体到文学艺术领域,粉丝多少固然不能和作品质量和创作表演者的艺术水平直接划等号,但不能否认,粉丝的存在客观上作为作品传播、艺人成长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而这一切又是文艺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粉丝还意味着文艺欣赏和消费的新方式。研究表明,以粉丝的身份和方式欣赏或消费文艺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文化再创造的过程。粉丝面对文艺作品及其创作者、表演者时,常比一般观众付出更多心理成本。对于粉丝而言,观看自己偶像出演的电影电视或舞台剧,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参与,并不是文艺欣赏的终点,而是文化创造的起点。他们更加关注文艺现象或活动的细节,致力于解读和发掘更多可能性,并将这种可能性与自身的文化需求更主观地链接起来,从而创造出别有趣味的新文本。这样的文本既作为原作品的衍生品而存在,同时又包含了孕育自粉丝群体及其文化活动的共同兴趣和集体幻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妨把粉丝视为一个横跨在文化接受侧和供给侧的群体,他们兼具文化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身份,其文化欣赏或消费活动理应视为独特的文化生产和审美实践,只要引导得当,就能对文化建设产生积极作用。

其次,不能脱离粉丝现象的网络性。如前所述,把当下的粉丝现象与其此前形态区别开来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互联网。2024年是我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30周年。2025年1月发布的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三十年间,中国互联网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跨越式发展,网民规模从1997年的62万人增长至2024年的11.0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升至78.6%。网络艺人在规模和质量上的进展则使其成为当代中国人当之无愧的精神家园。技术领先的互联网基础设

争鸣

戏曲文化生态要警惕“异化”危机

■ 夏烈

戏迷始终是推动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力量——从街头巷尾的票友清唱,到专业院团的观众互动,从口耳相传的经典剧目赏析,到戏迷传递的艺术熏陶,一代又一代戏迷以对戏曲艺术的关爱、对文化根脉的认同,不断为戏曲注入鲜活生命力,成为戏曲文化生态中不可或缺

的“土壤”和“养分”。然而进入互联网、自媒体时代,中国戏曲的文化生态却迎来一场不容忽视的“异化”危机:部分戏迷不再关注《霸王别姬》里“剑舞”的力度与留白,而是执掌于演员直播的礼物数;不再在意《牡丹亭》中“游园”的诗意如何传递,却热衷于为偶像演员拉踩骂驾,控评刷榜,“冲票房”“刷热搜”;他们不再聚焦于戏曲艺术:唱念做打的程式之美,文戏武戏的文化积淀,经典剧目的精神内核,而是在有形无形的各种各样的狂热中,将承载中华文明厚度的戏曲艺术异化为满足他们个人情感宣泄的、私人领地,把需要静心品味的艺术欣赏异化为流量至上的娱乐消费,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毒瘤“饭圈里的戏迷”。当前戏迷的饭圈文化正在不断消弭中国戏曲应有的美学深度,让不少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因误读而远离真正的戏曲艺术。首先,它消解了戏曲艺术的严肃性;当观众只记得演员的“萌点”而非“绝活”,只讨论“CP”而非“程式”,将戏曲作为“综合艺术”的非理性抽离,沦为流量消费的注脚;其次,它制造了戏曲审美的观众断层:年轻戏迷能背出个别偶像的所有社交动态,却分不清不同剧种

施、规模庞大的网民群体,尤其是蓬勃发展的、新貌迭出的网络文艺,都提供了粉丝生长的养分和土壤。多样细分的网络社交平台则在推动粉丝类型细分的同时提升着粉丝群体内部的黏性。微博的超话、抖音的粉丝团、豆瓣的小组等,都为粉丝个体“找到组织”“融入集体”提供了丰富载体。在这些专属的社群中,粉丝获得了“自己人”的亲近感,不论个体情绪释放和集体认同磨合,都具有了更便利的心理基础和沟通条件。与此同时,网络的放大镜效应也更明显地表现出来。近年来广受关注或诟病的圈层固化、自娱自乐、盲目排他、戾气泛滥等粉丝负面效应,大都与粉丝现象的网络性密切相关。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不能忘记粉丝现象里的人性。成为粉丝,本质上是完成了一次情感投射。偶像总是被粉丝赋予各种美好品质和形象,成为他们理想自我的象征。作为理性的个体,粉丝未必不知道自己已爱豆并非十全十美,但作为情感的投射,粉丝满足于通过表达对偶像的喜爱甚至崇拜,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期望转移到外部对象。而这样的心理需求,说到底,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又有谁不希望自己变得更加美好、更有力量呢?如果现实中难以做到,给自己找个“替身”过过瘾,不也是一种心理补偿吗?这大概也是文娱、体育等聚光灯下的领域更容易出现粉丝现象的深层原因。实际上,只有承认粉丝的根基在人性本身,才能把粉丝真正看作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才能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和积极包容的理性心态加以审视。

释放善意,保持定力,建构善治新格局

科学看待粉丝现象,引导粉丝发挥正向作用,关键在于妥善处理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关系。粉丝和偶像犹如一块硬币的两面。厘清粉丝和偶像的相处之道,是构建善治格局的根本所在。简言之,面对偶像,粉丝应释放最大的善意;面对粉丝,偶像应保持最强的定力。

《世说新语》记载:“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故事里的“观者”对卫玠投以粉丝的热情,追逐围堵,其结果却是把自己的偶像给“看死”了。类似例子在今天亦有复现,一些艺人苦于粉丝之扰,利用各种渠道发声,恳请粉丝不要干扰其私人生活,不要挑拨其与同行同事的关系。这充分说明,粉丝对偶像的“爱”如果脱离了“善意”的轨道,就会走向反面,形成“爱”之愈深、伤之愈烈的后果,所谓的“爱”也会变成失去理智的占有欲。做一名合格的粉丝,内心应充满善意。对于文艺领域的粉丝而言,对偶像的爱,应以对艺术的欣赏为基础,真诚欣赏偶像的艺术才华,为其取得的每一点成就由衷鼓掌。优秀的粉丝,应当成为偶像艺术

和人生道路的加油站而不是收费站,更不能当绊脚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要求粉丝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水平,即做一个有文化的粉丝。粉丝对偶像的善意,不能仅靠对偶像颜值的迷恋,更不能来自于对偶像私生活的兴趣,而是源自对偶像所承载的艺术的深度理解。只有爱偶像更爱艺术,把成为粉丝的过程变成认识和理解文艺的审美内涵的过程,把对偶像的关注变成对艺术的关注,才能真正理解偶像,才能把“爱”变成推动偶像成长和艺术繁荣的善举。

作为偶像,面对粉丝狂热的呼喊、高举的灯牌,应保持充沛的定力。而这份定力既来自于对粉丝现象的清醒认知,来自于对隐藏在粉丝之后的饭圈隐患和无良资本的自觉抵制,更来自于对艺术初心的执着和审美理想的追求。需要指出的是,保持定力并非拒粉丝于千里之外。从历史上看,大艺术家往往有粉丝群伴随左右。当年,梅兰芳先生周围的粉丝便被称为“梅党”,其中既有一般戏迷观众,更有被称为“梅党中坚”或“梅党健将”者,他们为梅兰芳量身打造新戏,撰写评论推介文章,处理演出和生活中的问题,纾解梅兰芳遭遇的舆论危机,为梅兰芳成为艺术大师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此,20世纪三十年代的报刊上便有公论:“民初梅浣芳露头角,实力捧场黄树,有梅党之称,若冯幼伟、李释戡、黄秋岳、齐如山诸先生皆为主力份子,聊公先生亦其中健将焉!或谓梅之成功,实梅党同仁之功,当无疑问。”时至今日,艺术创作和艺术家成长环境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观众对于艺术及艺术家的的重要性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因为网络社会的来临而更重要。今天的偶像更应认清形势,坚持德艺兼修,肩负文化责任,潜心艺术创作,以自身艺术才华和创造实绩吸引凝聚粉丝,和有较高文化艺术水准的粉丝建立亦师亦友的互动关系,让自己的粉丝群更加纯粹,让艺术创作的环境更加清朗。

粉丝现象是复杂的文化现象,其治理工作亦是长期的系统工程。承担治理责任的主体既包括党政有关部门、行业组织,也包括机构企业、网络平台和新闻媒体。2021年6月“清明·‘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饭圈”乱象得到遏制,粉丝文化健康发展迈出新步伐。着眼于构建善治新格局,要求进一步发挥党政部门主管统筹作用,推动文化领域行业组织强化行业教育、行业自律和行业服务,强化与文化领域中介组织以及网络平台的沟通协调。同时,充分发挥文艺研究和评论的力量,主动引入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工具,把粉丝现象纳入关注视野并针对其作出科学评价,在深化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构建当代中国的粉丝研究话语体系,使文艺评论真正在粉丝现象中发挥褒贬作用、激浊扬清、提高审美、弘扬新风的功能,引导推动粉丝成为促进文化繁荣的正向力量。

(作者系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读袁敏的《月光妈妈》

编者按:《月光妈妈》是袁敏追踪采访14年,数次深入藏地寻访典型人物,倾力创作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

袁敏,作家、资深出版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创作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多体裁作品数百万字。近年来,关注教育话题,先后出版有《蒜头的世界》《燃灯者》《巴大叔和他的孩子们》等,其对中国教育的思考和见地,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在《月光妈妈》一书中,她以一位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视角,用自然质朴的语言,讲述了月光妈妈及其爱心助学团队连续多年无私奉献教育帮扶事业,用微光照亮藏地少年成长之路,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感人故事,生动诠释了“师者如光,微以致远”的人生大义。

《月光妈妈》入选2023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2024年11月“中国好书”推荐书目等。

■ 王旭烽

每当新书出版,袁敏总会寄我,扉页上写“旭烽老友惠存”,字迹英姿飒爽,每次读罢我都会想:真奇怪,我在高校已经教了近二十年书,一篇关于教育的文学作品也未写过,而袁敏当文学编辑和作家大半辈子,一天专业老师也未当过,为什么会这样一部一部地写出同时代的有关青少年教育的作品呢?在我的排序中,哪怕继续写她发表于2015年的关于她母亲为原型的纪实作品《三小姐的抗战》,也应该比写青少年教育作品要更靠前些。因为,有些题材是别人和她共同拥有的,有的则只能属于作家本人。

我仍然在期待着袁敏回到自己的文学处女地。然后是2024年8月,袁敏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月光妈妈》在江西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她以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视角,讲述了月光妈妈及其爱心助学团队连续多年无私奉献教育帮扶事业,诠释了“师者如光,微以致远”的人生大义。主流媒体报道赞美作者敏锐捕捉创作主题、用超人的耐力持续追踪原型人物、用质朴感人的语言准确表达,创作出的一部具有深厚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学意义的报告文学。

《月光妈妈》作为一部反映当代东部有为人士助学西部贫困儿童善举的叙事作品,其真正令人深省之处,在于无论作者及她描述的主体,传递的是家国中人与人的纯粹互爱,是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担当。

作品体现了作者与被书写者的全部共情,资助者与被资助者的命运故事,偏远高原与沿海都市的现实距离……凡此种种皆得以充分描写,但不携带任何裹挟其中的私心杂念:没有一种下意识地上示下的高低对比,没有那种因怜悯他人而自我感动的傲娇,更没有一种以他人弱勢来衬托自己强大的丛林势力,落在人类命运体上的共情互爱,通过本书,成就质朴而不自知的叙述主体,反映了作者的初心,是相当难得的价值维度。

我们知道,无论创作主体选择的内容主题如何应时,如何踩在点上,也无论从故事到叙事、抒情乃至修辞如何讲究,报告文学的信息性、纪实性、真实性,都应该是最本体的。《月光妈妈》以饱满踏实的内容为王,令人敬佩地在这方面呈现出了只有报告文学才具备的审美质感。作为年近七十的女性作家七上青藏高原,其中的辛苦劳累无需细言,然采访的到位和细致,终究换来非虚构文体扎实饱满的厚重,具备了情节和细节、人物和故事的独特,那种非虚构的现实生活的魔幻,往往是虚构作品中不能自圆其说的。只要拿出那位没有双臂小女孩的命运举例,便可扼压群芳。《月光妈妈》中这样的少儿和主角,故事很多,充分传递出本书所具备的饱满完成度。

这部作品中的人们,包括月光妈妈、月光爸爸,在漫长的近二十年的资助活动中,建立了一支数百人的民间志愿者队伍,口口相传,没什么专门组织,也从不媒体上宣传,没有大老板,多是身边知根知底的朋友,城市的平民、布衣、职员、个体经营者。《月光妈妈》写了他们中的不少人,但也只是冰山一角。令人遗憾的是我和他们走得那么近,却没有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因此,我想解剖自己为什么在解读《月光妈妈》时,第一印象并非赞美而是冲击,是我对叙述者和被叙述者的震惊——因为所有

这些主角们,几乎都是我的发小、亲密的朋友,数十年来,我自以为很深深地参与着他们的生活和事业,从来没有和他们阻绝过消息。而《月光妈妈》突然使我意识到,这些非凡品质的人们,我真的了解他们吗?

其实,袁敏曾经去过川藏高原之事,我是知道的,但我并不清楚地竟然跟踪月光妈妈十四年,去过七次,我也知道她和月光妈妈高颖有很好的关系,我和高颖及她的先生作家袁明华的好友关系也非常悠久,从夫妻俩最早建立“耕读楼”青少年培训开始,我就蜻蜓点水般地介入其中了。月光妈妈夫妻参与建立的“橄榄树”学校,曾经名冠大江南北,袁敏曾经跟我不止一次地赞誉来过,还邀曾经我去参观他们的学校。我知道他们创业的艰辛,他们教育理想的伟大,和不甘苟且于现实的步履维艰,却从来没有像袁敏那样陪伴着他们一起经历,参与建设。而且我从来也不知道他们竟然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还为千山万水之外的川藏少年无偿捐资捐力,就连疫情期间,他们非常困难时也没有中断,他们从哪里来的能量一直坚持呢?

这是我一直在寻觅的答案:为什么?因为共情吗?这种共情的初心和能力究竟从何处而来?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因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悲悯,但悲悯总是会带着一种自上而下的上帝的视角;或者还是缘于人类的理性判断,强者必然倾向于弱者自然法则?寻找答案,不仅是为了解读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东部发达地区有这样一群人为何自发地对西部地区教育发展的支持,也是为了解读袁敏为什么会多年来一直深耕于青少年教育领域。

由是开始琢磨“月光”。月光妈妈是藏族少年们对杭州高颖的爱称,被袁敏用来做了书名。这使人联想起“月印万川”的禅语:“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就像江河湖海都能倒映月亮,而江河湖海上的月光都源于天上唯一的月亮。

一切水就是芸芸众生,一月则是禅性。南宋大理学家朱熹便得道而言:宇宙间有那么个大道理,它在天地万物未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天地万物禀气而生时,同时也禀赋了这个理,天理就相当于天上的月亮。江河湖海,就是万事万物。月映万川,就是万物禀赋了天理。天理是什么物?春秋末期,孔子的儒家学说提出了“仁者爱人”;而亚圣孟子则提出“人性本善”论,并以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慈善之举之事,正是建立在仁爱恻隐之心性的善论之上的。数千年来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直至今今天,尚未有定论。而在《月光妈妈》这部滚烫的现实主义土壤中正在发生的真实故事,则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揭示人性的角度。

如果说天理就是光,那么,同一阶层或同一精神气质的人们,往往就能够接收到同频度的光,于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成为一种可能。他们之所以能够实现一种双向奔赴,乃是因为身在东部的人们感受到的西部少年们的艰辛,正是他们在东部同样也在经历着的艰辛。同样的程度,同样的无奈,同样的渴求,他们在西部少年的目光中完全对上了。恰恰是《月光妈妈》告诉我们,无论东部的志愿者们,西部的失学少年,他们都是求者,也都被求者。真正的慈善,是一种相互的拯救,所谓命运共同体,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相互拯救关系之上的。

而无论月光妈妈,月光爸爸,月光爷爷……包括写月光的袁敏,他们同时都在经历着这个时代所有的普通平民正在经历着的甜酸苦辣。甚至自己在精神与物质相对匮乏、甚至压力山大之际,他们才能实现那种量子纠缠式的行动,分别时,他们一定会为千山万水之外的高原儿童们牵肠挂肚;而当他们在高原彼此拥抱时,他们会被对方热切的目光点化。光点亮了他们,他们开始恢复元气,孩子们看到希望。

前不久我问过一次袁敏在何处,她说她回到父亲当年抗日打游击的浙东,深入采访去了。我已然明白,其实她一直在一条文学之路跋涉,就如无论是《命运》,还是《致爱丽丝》,终究都是贝多芬的作品。而无论山高月小,还是月涌大江,都是月印万川。

(作者系浙江农林大学教授、茅盾文学奖得主)